

古代调研重寻“拔本塞源”之策

《人民法院报》刘永加

“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，成事之道。”在古代，有作为的帝王、大臣和官吏，都是在做好调研的基础上开展工作的。当然，他们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，但大多注重问题导向，因病求方、对症下药，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，在历史上留下不少有关调查研究的良好佳话。

微服私访听民意

提到古代帝王官员的调研，人们会想起来微服私访，这一活动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，为后来历代贤明君主大臣所效仿。

古时候的调研除了微服私访，帝王官员也会轻车简从下基层，也有的是前呼后拥下基层，但是归根结底，要看调研的成果。

唐代时，有一位帝王就创新了微服私访式的调研，他能够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，去了解民情民意，他就是唐宣宗。作为唐代后期较有作为的一个皇帝，唐宣宗“久历艰难，备知人间疾苦”。因此，他即位后，不仅“虚怀纳谏”群臣进言，还特别留心地方官的政绩，以便能够及时进行升赏。

一次，唐宣宗出宫射猎。途中，遇到一位樵夫，宣宗立即驻马，开始了他的微服私访式的调研。他问樵夫是哪个县的人，樵夫说是涇阳人。宣宗接着问：县令是谁？樵夫回答：叫李行言。宣宗更进一步问：“为政何如？”樵夫也不知道是皇帝在问话，就照实回复：“性执。有强盗数人，军家（指北衙禁军）索之，竟不与，尽杀之。”宣宗听后若有所思，自认为陌生人的评价更中肯。

回宫后，唐宣宗认为涇阳县令能够不避权势、为民除害，于是就将这个县令的名字记下来贴在寝殿的柱子上。一个月后，海州刺史空缺，宣宗立即将李行言任命为海州刺史，并赐“金紫”穿戴。

“水晶灯笼”灯下明

在一切工作中，最怕的是灯下黑，有些官员好高骛远，往往对发生在身边很近的人和事没有看见和察觉。

在宋代，有一位官员就善于解决“灯下黑”的问题，因此被老百姓誉为“水晶灯笼”。

这位官员就是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开封考城县人刘随。他以进士及第入官，被任命为永康军（今四川灌县）判官。

刘随到任永康军后，他知道许多问题都需要走出去寻找解决办法，那就是深入辖区去考察调研。他先是来到当地孔庙，见到庙宇杂乱污秽、荒草丛生，听说负责管理祠庙的楼店务已将庙中一片空地租了出去，准备营建居舍。刘随当即下文给楼店务，责令其立即收回出租之地，并维修管理使用好孔庙，从而“使蜀人知有圣人”。

在调研中，他发现永康没有水井，当地居民饮用水，全都依赖附近的导江之水。每到冬季，江水冻涸，人们只得去离城二十里处取水饮用。由于饮水艰难，人们常常饮食不时，不少人因此患病，甚者死亡。人吃水尚且如此困难，那就更难以喂养家畜家禽，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。更为可怕的是，一旦发生火灾，也难得一勺灭火之水。

面对这一严重情况，刘随下决心修建一项通水工程，根除永康的缺水之患。他徒步登上永康城附近的鱼鳃山去考察，发现这座山可以俯视全城，且山后有一股很大的泉水，如果能将泉水引到

城中，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用水问题。于是，他通过实地勘察，终于找到引水入城的办法，组织人员开展工程建设，将泉水导入了永康城。

基层调研减赋税

走群众路线，是调研的最基本出发点。想通过调研了解实情，必须扑下身子，与百姓打成一片。

在明代，官员调研已经成为常态，多数官员能够做到深入基层，知民情解民意纾民困。周忱便是其中一人。

明宣德五年（1430年）九月，正担任工部右侍郎的周忱被任命为江南巡抚，总督税粮。而彼时的江南作为发达地区竟然拖欠国家税赋。

周忱来到江南，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。一天晚上，周忱微服私访，经过一个村庄时，见树下有个人坐着乘凉，便上前同他搭话。直到属员们找到这里，那人才知面前的人竟是江南巡抚。就这样，周忱从百姓口中了解到了许多实情。

周忱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人，他身边常带一个记事簿，在深入基层调研时，无论大事小情，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，连每天天气如何也都记录在册。起初人们都不知这样做有什么用处。后来有一次，有人报告说运粮船因大风翻沉。周忱翻开记录簿，那天根本没有风，骗局一下子就被戳穿了。

通过微服调研，周忱从百姓那里了解到，江南之所以拖欠那么多税粮，主要是富户不肯交纳赋税之外的加耗部分。这部分加征就只好摊派到一般农户头上。针对这一情况，周忱回来立即研究，最终创立了“平米法”，无论大户还是小户都要严格平均承担耗米。又请工部颁发铁斛，让各县依式制造，革除了各地粮长大斛入小斛出的弊病。

周忱还了解到，以往各粮区设粮长正副三人，每年七月赴南京户部办理公文，然后再送北京户部，往返费用均由百姓分担，因此百姓负担很重，苦不堪言。

于是，周忱予以改革，下令各粮区只设一人，轮流赴南京，然后交由有关部门上送北京，这样果然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江南拖欠税赋的问题慢慢地解决了。

寻拔本塞源之策

调研的一个重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，在调研中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。

清雍正四年（1726年）由广西巡抚调任云贵总督兼辖广西的额尔泰，不久向雍正帝连上奏折，大谈西南几省改土归流问题以及解决办法。听到额尔泰上奏折再次提出改土归流，“盈廷失色”，大臣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因为早在额尔泰之前广西提督韩良辅、贵州巡抚石礼哈和毛文铨、云贵总督高其倬等都向雍正帝提出过改流建议，但均遭到雍正帝的驳斥。

然而，大家没想到的是，雍正帝看了额尔泰的奏折后，却立即批准，并委以重任，命令他去解决这个问题。大臣们颇为不解，后来雍正帝才说明了其中的原因，前面韩良辅等人，一是没能拿出具体方案，所言只是“小知小见，乃攀枝附叶之举，非拔本塞源之策”；二是他们“非能办理此事之人，故未允其请”。

原来，此前额尔泰在广西任巡抚时就对此事已经做了一些调研，所以知道改土归流的紧迫性。此番新任云贵总督后，他更是加大了调研力度，坚持问题导向，直面百姓问计。

额尔泰在调研的基础上，分析了整个形势，适时提出了改土归流的重大决策，制定了全面的改流方案。他连上几个奏折，详细阐述了改流的必要性、迫切性，并强调，“不改土归流，终非远计”，“滇黔必以此为第一要务”。

额尔泰主持了西南几省的改土归流，革除了大批土司，而代之以流官的管理，并实行与内地一样的地方行政制度，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管理，有利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，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

地名彰廉德

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王影

地以名传，名以人传，人以廉传。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，有不少地名因廉洁人物、廉洁故事而生，其蕴含的精神至今仍闪烁着崇廉向善的光芒。

贪为耻，廉为荣。“廉泉让水”的成语背后包含着多个廉洁地名。南朝刘宋时，在梁州（今陕西汉中）任职州将的范柏年进京汇报工作，宋明帝刘彧与他闲谈时，忽然问道：“广州有水名曰贪泉，据说饮了此水就会变得贪婪，你可知道？”接着又一语双关地问：“梁州是否也有这样的泉水呢？”由此及彼，宋明帝真正的用意是想问你们那里有贪腐的官员吗？

范柏年的回答非常精彩，“梁州唯有文川、武乡、廉泉、让水。”廉泉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，又称廉水、廉津，是至今还在使用的一个名称。范柏年并非单用廉泉回应，而是同时举出“文、武、廉、让”这些寓意美好的地名，且以“唯有”两字强调，可见当地风俗良善。宋明帝随即追问：“卿宅在何处？”范柏

年坦荡以对：“臣所居廉、让之间。”此答亦甚巧妙，既是事实住在廉泉与让水之间，又含蓄表达了自己追求廉洁礼让的品格。

若说到廉洁礼让的品格，“六尺巷”的故事不得不提。在安徽省桐城市，有一条长100米、宽2米的巷子，建成于清朝康熙年间，小巷出口有一块刻着“礼让”二字的牌坊。六尺巷源于清朝大臣张英的家人与邻里的土地纠纷，当时双方争执激烈，张英家人便向在京为官的张英寄信寻求支持，没想到张英回诗一首，“千里来书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家人阅罢，明白其中含义，主动让出三尺，邻居也深受感动，同样主动让出三尺，这样就形成了六尺巷。

廉洁是清清白白做人、干干净净为官，古人常用“清如水，明如镜”来形容一个廉洁之人。宋代铁面御史赵抃赴成都上任，仅携一琴一鹤，他目睹江水清澈浩荡日夜奔流，不由心有所感，借水立志，指着江水发誓道：“吾志如此江清白。”从此赋予了青白江丰厚的

廉洁底蕴。赵抃说到做到，在成都任职期间，他注重以身作则，每天晚上都会焚香祷告，反思有无不可告天之言。他整顿吏治，提倡节俭，反对奢靡，蜀地由此大治。如今，青白江依旧静谧流淌，成都的青白江区也因此得名。

在美丽富饶的萧绍平原上，有条江好像银色的飘带一般，这便是钱清江。东汉刘宽任会稽太守时，简政爱民、惩治不法，深得百姓爱戴。在离任时，有几位老人从若耶谷中出来，以百钱相送，并说道：“别的太守治理时，派遣官吏搜刮民财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您在任时，政治清明，治下太平，我们得了安宁，所以想聊表心意。”刘宽不肯接受，再三推辞，反复推让不下，为了让老人放心，刘宽从每人手中各取一枚钱，就此告别。出了会稽地界，刘宽便把钱投到了江里，后人将该江改名为钱清江，还建了一钱亭、一钱太守庙。

地名为人所起，一山一水皆有情，承载的是传承已久的人文共识，是我们对廉洁的推崇。



赵抃像。他曾借水立志，愿为官处事如江一样清白。资料图片